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五〇期 ——  
(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206a)

---

【风云人物】	文革狱中三个案情特别的干部子弟	王学泰
【当事者说】	我经历的 1976 年天安门事件	吴忠 · 陈楚三 · 李大震
【史海钩沉】	山雨欲来——彭真“冷藏”姚文的历史背景	萧象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风云人物】

### 文革狱中三个案情特别的干部子弟

• 王学泰 •

谈到文革进监狱这一段特殊经历，常常有人问我，“里边的干部子弟多不多？”为什么北京人对这个问题特有兴趣？因为干部子弟在北京是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群体，特别是在文革之中。

北京的干部子弟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思想性格大体上有些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一般青年人不敢干的，他们敢干，在对待天下大事上有一股舍我其谁的派头。这在“充分发动了群众”的文革中显得特别抢眼。

我在读“大三”“大四”（1963—1964）期间，曾与一位高干子弟同宿舍，其父是位五级干部，很有些资历。这位同学比我大三四岁，曾在报社工作过，思想比较成熟，为人也比较谦和。他曾说起，有些干部子弟、特别是上了大学的，多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谁都敢骂。也许这辈子连科长也当不了，可是连部长也不在他们眼下。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心态，文革初期，北京最早被发动起来的就是在大中学校学习的干部子弟。他们最先组织了“红卫兵”和各种战斗队、积极响应“革命造反”的号召，在学校最先批斗校长和老师。“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为毛戴红卫兵袖章的那位女红卫兵也是干部子弟。后来由于批“资反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多高级干部被整，不少的高干子弟出面保爹保妈，

炮打中央文革。此时有一些干部子弟被捕，关押在看守所K字楼。我在K字楼时还听说过叶剑英家有几位子女就在这里呆过。其实叶家子女进K字楼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但到了1975年仍然有人说起此事，可见它给北京人留的印象之深。关于一些干部子女中学生反文革小组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统统释放，后来与他们同龄人一样上山下乡做了知青，再后来有关系而且乐于利用这种关系的，纷纷走关系参军或早早地分到各单位工作了。

一监三中队除了与我有间接同案关系的顾某是名高干子弟外，还有两三个接近高干（北京一般在行政八级以上被认定为高干）、中干家庭的孩子，其进监狱都与文革直接相关。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张建旗，一是胡智，一是彭灼南。

◇ 张建旗：从反周到反毛、拥林

现在知道张建旗这个名字的恐怕不多了，如果了解文革时期诸阶段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可能知道他的人就会多一些。清查“五一六”，被史家认为是针对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称作“五一六”的全国性的组织，可是在这段运动中却有超过一千万人因被怀疑参加了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而被整肃、甚至遭到严重的迫害。其起因，就在于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

张建旗于1967年春夏之际组建了“五一六红卫兵团”，后来又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联合起来，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不觉得自己在场文革运动中不过是木偶戏中的玩偶，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认为自己是能够主宰天下、引领潮流的“风流人物”。因此许多组织动辄“兵团”、“纵队”、“总司令部”，名目都很吓人，“五一六”也不例外。它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军事口、外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八个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说的如此热闹红火，实际上其固定成员也不过二三十人而已。最初因为提的问题尖锐，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他们派出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繁华热闹之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恩来的传单，涂写反周恩来的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当时毛正批“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文革初，聂元梓等北大造反派发迹于反北京旧市委；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发迹于反刘少奇；张建旗等人没有想到北大、清华那些人并非是偶然赌赢，他们背后都有能够决定或知道运动走向者的支使，而张建旗等却是盲人瞎马，不了解中央部署，揪人专拣大的来（当时有“公安六条”规定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对于其他人没有特别规定），最后成为人人喊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年9月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点出“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于是“五一六”便定格为现行“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随之掀起抓“五一六”的大规模运动，绵延数年，涉及人数达一千万之多，成为文革中最大规模的迫害群众的运动。

作为始作俑者的张建旗，于1967年8月被逮捕，这些学生都押在K字楼，他们既不是拘留，也不是逮捕，只是说是“办学习班”。那时有毛主席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因此张建旗被“抓进”的是“学习班”，当然，学习班也就是名声好听些，其实也与监狱差不多。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我家》中写到张建旗，他说张建旗也在K字楼关押过，后来毛主席倡导办学习班，他们一起被拉到北京北郊的“第一少年管教所”去参加“学习班”：“最让我难忘的是‘5.16’头目张建旗，钢铁学院大学生。在半步桥关

押时，据说受尽折磨。关押一年多，始终戴着镣铐，背铐半年，后来转为前铐。到学习班时，已患上肺结核、肝炎、肾炎等多种疾病，瘦弱不堪。为了得到较好的营养和治疗，他假装承认自己做错了，军代表十分高兴，大会上对他进行了表扬。待他身体稍有好转，立刻声明，承认错误是为了活命的权宜之计，坚决不承认以前有什么错。前期学习班释放了张建旗以下的几个‘5。16’头目，军代表又把他们之中的几个人请回来，劝张认错，张把他们痛骂一顿还是不认错。后来虽然他也被释放了，可惜听说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155—156页）“学习班”结束后，干部子弟绝大部分都释放了。遇罗文认为张建旗放了以后故去。其实不然。

此时抓“五一六”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在全国展开，陈伯达是主抓这个运动的小组长，组员包括公安部长谢富治、空军司令吴法宪等。清查和批判“五一六”已经升格为中央的战略部署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张建旗又不肯认错，因此被北京市公安局释放的张建旗又被公安部逮捕送到秦城监狱了。

许多研究文革的文章都说张建旗1970年被枪毙，其根据皆是师东兵的《吴法宪访谈录》中的一段话：“五一六就是有个叫张建旗的学生组织的一个反总理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到处拉关系，和《红旗》杂志的林杰这些人勾结上了，最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建旗在一九七〇年被枪毙了。后来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闹了，什么人也挂上了五一六，就和现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样。”可是在吴法宪本人写的回忆录中，虽然也谈到了“五一六”问题，就没有说到张建旗被枪毙这件事。这段故事看来是师东兵向壁虚构的。

张建旗没有死，1976底（或1977年初），他被判20年有期徒刑，送到一监三中队服刑。

张建旗刚到三中队时披着棉大衣，拖着几只大箱子，箱子里装着许多衣服（包括有将校呢军装）与书籍。一看就知道他的家不在北京，家在北京的犯人一般把平常用不着的东西送回家了。后来知道，他确实不是北京人，家在黑龙江哈尔滨，父亲早年去过延安，后来牺牲了，算是革命烈士子弟；他母亲本身也是延安干部，文革前是黑龙江省厅局级干部，丈夫死后又嫁的丈夫、也就是张建旗的继父，是个省部级的干部。张建旗有点自命不凡，个子很高大，约在一米八以上，身体的宽度、厚度都能与身高相匹配。他腰板挺直，脸有些黑，四四方方，一副目下无尘光景，只是脸稍有浮肿、鼻子尖有点红，好像被冻的一样，显得有些可笑。他很少与人说话，收了工也只是一个人在筒道里背着手走来走去，像电影里千篇一律描写大人物思考重大问题时的情状。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他就是文革中享大名的张建旗，他也逐渐透露出自1967年以后的经历。

张建旗在秦城关了几年，到了林彪出事以后，1972年，中央专案组找他谈话，说他没问题（张建旗他们当年反周，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所谓“二月逆流”，林死后这个问题一风吹了），便放回到北京钢铁学院，并答应给他分配工作。回到学校后，因为校方还追问他过去的问题，张建旗坚持反周立场不变，但因为林彪事件的出现，他又增加了反毛（他父亲是烈士，母亲是革干，可能原来是“四野”系统的）的新主张，而且公开同情林彪，因此就没有分配工作，由北京市公安局送去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了。1976年地震时茶淀因靠近唐山是重灾区，事后对犯人和准犯人（或称二劳改，指劳教人员和劳改、劳教释放后在当地的就业人员）管束很严。此时中央专案组又来谈张建旗谈话，张建旗批判他们言而无信，双方先是语言冲突，后来竟扭打起来，张建旗被打情急，呼喊了反毛口号，于是便从劳教升级为逮捕判刑了。1976年底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年属于重刑犯，这样他就不能在茶淀农场服刑了，被送到了一监。

张建旗真是一个怪人，不知道他本来性格如此，还是被关押得久了和一门心思学马列、坚

决要做革命者的走火入魔而导致的极度偏执。他似乎把“彻底革命”四个字贴到了自己的脑门上，处处要表现出与其他犯人的不同。平时，他很少与别人说话，其说话的对象只局限在三五个人内，大多是属于纯政治问题的学生，如下面要谈到的胡智、彭灼南等。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学生，或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他觉得这些人单纯些。胡智对我说，建旗刚到一监不久就跟他说：“别信他们的，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不是林彪，林彪还活着，他在阿尔巴尼亚。”这倒是个独特的说法，近来林彪一案又引起网民的关注，关于林彪的死仍是众说纷纭，但我还没有见到持张建旗这种说法的。

张建旗有时也跟我聊聊，多是问些事情，问问监狱的情况。从不主动与狱警、看守说话。前面说到监狱的饮食还是可以的，定期有细粮米面和鱼肉。每逢改善，他都坚持吃窝头、咸菜，把细粮鱼肉给彭灼南等人吃。他有时就干啃窝头，一手拿一个，在筒道里走步时咬一口左手中的窝头，走几步，待口中窝头咽下了，再咬一口右手的窝头，如此左右交替直到两个窝头吃完为止。他走来走去，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张建旗独来独往、也不违反监规，看守人员一般也不愿意找他的麻烦，因为弄不好，可能还碰一鼻子灰，何苦来。

可是中队有个指导员姓罗，因为他个子矮，又好装腔作势，大家暗地叫他“萝卜头儿”。他自觉担负着改造犯人的使命，特别注重犯人的思想改造。1976年下半年以后本来接见送书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了，哪个队长也不管，可是萝卜头儿非要管，因为他知道书是会影响思想的，千万不能放松。然而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弄不清什么书对于改造犯人思想有利，什么不利，因此很好糊弄。那时家里给我送的《左传》、《范注文心雕龙》都拿了进来，都是跟他说这是“法家著作”（当时搞“评法批儒”运动的余威尚在，法家著作的革命性仅次于毛主席著作）。他就会笑着说：“带进去好好学学，别让家里白送一趟。”可是鲁迅著作决不让送。有一次中队开会时，他还煞有介事地教诲大家：“有个事儿这里说一说。接见的时候，有的犯人的家属送鲁迅的书，我们没有让拿进来，但没有讲道理。今天我讲讲道理，为什么不叫大家读鲁迅著作。鲁迅的书是揭露旧社会的，你们是揭露新社会才犯罪的，如果你们看了鲁迅的书，更要揭露新社会了。怎么认罪服法啊？这次我把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口服心也服了。”

他有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遇到死心眼儿的张建旗便出现了尴尬和可笑的局面。1977年初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被停止发行）。监狱要大家学习，大多数犯人不是家里送了，就是在监狱买了，只有张建旗若无其事。其实，张建旗平常也不看什么书，连监狱里发的《人民日报》也不看，收工了没事就是在筒道里走步。萝卜头儿这天披着棉大衣对走过来的张建旗说话，张建旗脚不停步，罗追上两步，仰着头跟他说：“张建旗！你这是怎么回事儿，既不让家里寄‘五卷’（指《毛选》五卷），也不买，你怎么学啊？”走在前面的张建旗回过头来给他甩出一句：“你不知道我是反毛泽东的？”他声音很大，萝卜头儿呆了，筒道里的其他犯人也呆了。罗竟一句话没说，讪讪地走了。张建旗仍然脚不停步。

1978年我平反出狱，就不知道张建旗的信息了。最近听与他一起直至1979年末最后一拨平反的胡智说。从1978下半年开始的平反运动里，中央专案组又到监狱找过张建旗几次。胡智与张建旗放在最后，张向政府表明坚持自己的观点，反毛，反周、拥林，决不改变。北京市委讨论过他与胡智的平反问题，最后还是把他们放了。释放后再也没有张建旗的消息了，听说有人在地安门一带见过他，他还滞留在北京？

#### ◇ 胡智：为毛泽东去世召开庆祝会

毛泽东的生死观很通达，可惜他的后继者都缺少他的气度与胸怀。他最早倡导改革殡葬制度，死后火化也是他第一个签的名。可是他去世后华国锋固执地要永远地保存他的遗体，粉碎“四人帮”后控诉江青罪状时说，江要毁坏毛主席遗体。这个指责透露了作为毛的家属的江青

当时是要按毛的意志来办的，而华是要把保存遗体和大修纪念堂当作自己是承接大位的正统依据来办的。另外，毛讲到自己死后人们应取的态度也很通脱、或说有点幽默。1959年毛泽东就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还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可以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这些话讲得大度而幽默，是哲学家的态度。可是这些话在那个他已经成为神的时代，也就是只能由他本人说一说，他人连想也不敢想，因为这样想一想都属于犯罪。若让人知道了，轻者进入牢笼，重者死于非命。

然而毛逝世之时，北京还真有个胆大妄为的干部子弟想到要开个庆祝会。

胡智的父亲是外贸部的老干部，文革初也没有逃过挨整的噩运。那时胡智还只是十来岁的小孩。部里的“叔叔阿姨”（平时都是熟人）来抄他们家时，把他关在厨房里，使他感到特别恐怖，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父亲又被关牛棚、下放，被当作异类，前前后后有七八年之久，因此给他种下了对文革敌视的种子。此时正是胡智的成长时期，这本来是灌输对毛主席崇拜的年龄段，胡智却因为家庭的不幸而缺失了这一环节。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公开以后，北京陷入一片悲痛与恐怖之中。二十岁的胡智忽发奇想，他要组织几个哥们开个庆祝会。

我曾经问过他：“毛主席去世了，北京人都很悲痛，你怎么冒出这种想法呢？”

他说：“你说北京人都很悲痛，这不一定。如果他在文革初去世，没准会是这样。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得罪的人太多了。人们仇视文革，自然降低了对毛的尊敬。”

“那你应该害怕自己的想法呀？”

“那时刚刚二十岁，还不懂得什么是怕。”

这是实情，北京许多干部子弟胆子大，常常能干出超人想象的怪事，这是尽人皆知的。后来经历文革、经历上山下乡，早一拨敢冲敢闯的干部子弟逐渐成熟起来，做事也日渐稳妥。可是胡智属于后起来的一拨，没经过上山下乡，他们本来就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再加上那年头整天宣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革命造反精神，弄得许多还不太懂事的青少年有一股浑不吝的劲头。1976年的“四五事件”也与这些敢做敢闹的干部子弟有关。胡智在1976年的4月初也去过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为当时受到江青等人打压的邓小平鸣不平。后来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打成“反革命事件”，这又给胡智内心积累了新的不满。于是，他才会产生要“开庆祝会”的大胆而叛逆的想法。与他相好的几个同学和朋友性格也大都类似。

那时，7月28日的大地震才过去一个多月，许多人还睡在地震棚里。在胡智的提议下，9月10日这一天，他们几个便聚在胡智的地震棚“家”中开庆祝会。几个年青人竟然背着吉他、大大咧咧地骑着自行车到胡智这里来聚齐了。那时北京正处在一级战备之中，警察们也都瞪大了眼睛，国丧期间，又有禁止娱乐的严格规定，携带乐器在大街上行走都特别扎眼。几个年轻人很快引起了关注。因此这个“会”还有开起来时，一个警察带着几个民兵和几个“小脚侦缉队员”已经尾随着进了他们聚齐的地震棚。警察们一进地震棚，惊呆了：

地上竟有毛主席石膏像的碎片！

这些青年刚才干了什么不言而喻。警察和民兵一下子把胡智等人围了起来，并招呼了更多的警察把胡智几个捆了起来、一起抓走了。

这是毛泽东去世时北京最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之一。

进了局子后，此案马上被当作重点案子审讯，前前后后一共审了数十次，苦头吃了不少——此时审讯人员为了表明自己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的正确，有可能采用任何手段。胡智说，最初审讯规模极其庞大，预审员与驻公安系统的军代表一起上，有时审讯员竟多达数十人。审讯室小，连坐着的地方都没有，大家都站着，只有被审的胡智一个人坐着。当时是华国锋主政，强调继承毛主席遗志，于是胡智就成为最好的反面教员。他被拉到市内各种大会上批斗，以教育群众。

然而事情很奇怪，他于1976年9月10日被抓，但一直是拘留，直到一年之后的1977年10月才正式被逮捕；被捕之后，改由北京市高法提审了。接着又有一怪事：审是高法，而判的时候却仍是“西城区人民法院”，1978年4月10日胡智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然而判决书的编号却是“1976年度刑字第72号”！这些矛盾后面有什么背景？直至今日仍不得而知。

这个判决可能与“拖”有关。时间对胡智有利。如果这个案子在1976年判，他必死无疑。1978年4月10日的“判决书”中说：“胡犯思想极端反动，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自1976年4月以来，经常纠结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张待林、王照轩、范士华（均另案处理）等多人，在一起散布反动言论，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扬言要拉队伍上山打游击，自命为司令，张犯充当参谋长，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政权。更恶毒的是，1976年9月9日后，胡犯疯狂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损毁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在押期间，抗拒改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胡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当“判决书”写到“民愤极大”处就完全是个立即执行的死刑犯的判决词了，如果有“缓”，下面就应该有个转折，比如说“该犯在押期间尚能悔罪知过，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同伙，有立功的表现”等等，这样才能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而这份判决书在“民愤极大”之后又进一步加码：“在押期间，抗拒改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按过去的规矩，这是非死不可的了。然而胡智还能逃脱这关，判为“死缓”，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时代在变。虽然粉碎“四人帮”后，1976、1977两年，仍在主持北京工作的市委书记吴德还一味坚持1976年10月6日之前反对“四人帮”还是“现行反革命”，但到了1978年，整个社会风气都在变，话剧《于无声处》（歌颂“四五事件”的）和天安门诗抄或在剧场演出，或在报刊登载，邓小平也出来工作了。“天安门事件”虽然在整体上尚未平反，但谁也不敢坚持说它是铁定的反革命事件了。因此，这个判决坚持胡智判死刑、在“判决书”中沿用的语言还延续过去的认识，但没有搞“立即执行”，说明判决者也拿不准这个问题，他们给胡智留条命，也给自己留下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胡智也没有敢上诉，后来他说自己怕被枪毙。

我在一监见到胡智时已经是1978年的5月了。那时他还像个小孩儿，一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不像个被判死缓的。也很巧，他到一监不久，1978年下半年社会上拨乱反正、平反冤狱逐渐被提上日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致信陈云，就说：“为了实事求是地、公公道道地弄清每个老干部的功过是非”，请陈云向中央“写几句话”）。但胡智的问题的解决已经属于平反运动的末班车了。西城区法院所给“再审判判决书”后面所署时间是1979年12月30日。这个判决书写得特别简单，在叙述了原判刑期后说：“经本院复查认为：被告人胡智的行为，不构成反革命罪，原判应予纠正，故改判如下：一，撤销本院1976年度刑字第72号判决；二，宣告胡智无罪，予以释放。”

据胡智说，中共中央为此下过文件，市公安局和胡智父亲的单位外贸部也都下过文件。平反大会是在西城区法院礼堂开的，新华社有记者参加。被抓时他还是在家待业的学生（或说是

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但放他的同时却为他找了一个好工作，释放后不到一个星期，1980年1月4日他就到七机部（现在的航天部）上班了。

胡智在七机部所属的工厂干了13年，当过电工，搞过供销。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了第二次改革后，胡智也辞职下海。他办起了生产水消毒罐的工厂，以供高层建筑使用。此时北京正是高楼林起之时，这些楼顶上都要装上这种能够自动消毒的水罐。他的生意特别好，水罐销路极好，偶然碰到他，胡智满面春风，已经是个成熟的商人了。后来，他卖了罐收不回来钱。那时欠钱的是爷爷，自己是债主、也是三孙子，杨白劳、黄世仁的关系颠倒了。胡智整天就是走门子收账——他说连要账也要走后门，拉关系，谁能还钱，还要给他们个人一些好处。这真是中国特色。干了13年，胡智收摊儿了，把工厂关了，不再生产了，专力收债。有时间了就旅游、读书，倒也自在，不招灾、不惹祸，朋友有事他还能帮帮忙，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 ◇ 彭灼南：刺杀迫害父亲的保卫处长

按说他不能算干部子弟，因为父亲彭嘉衡从民航局退休时是没有职称，没有级别，没有职务的。然而自从前几年民间发起找寻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老兵时，发现彭嘉衡是住在北京仅存的美国第14航空队（又称“飞虎队”）、中美航空联队中的军官，成了媒体关注的红人。媒体与民众才开始关注彭嘉衡的历史，按照其经历与贡献说他是位中级以上的干部并不为过。

彭嘉衡1937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1941年考入昆明中国空军军官学校，1942年被选送美国亚历山大州凤凰城高级飞行学校深造。抗战结束后，作为华侨，他回到印尼与父母团聚。1950年，他在报上看到国民党政府两航（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人员起义的消息，他也回到大陆参加祖国建设，并与抗战末期认识的女友履行婚约。他进入军委民航局任飞行副驾驶，1954年被正式任命为机长，并负责培训飞行员。十多年里，彭嘉衡主要从事专业航空，先后执行过包机、护航、探矿、护林、灭虫等急、难、险、重任务，共飞行7000多个小时。按照这种经历、再考虑到1950年代缺少技术干部的情况，他怎么也应有个中高级职称了。

彭灼南本人也很羡慕干部子弟，他天地不怕，是个蔫大胆，还真有点干部子弟的作风。在一监时，有次闲聊。他说，我爸爸如果1949年去了台湾我也是个国民党高干子弟了吧？那时我就知道他爸爸与妈妈是建国后结的婚，妈妈是大陆人。我说那你爸爸的后代就不是你了。彭灼南挠着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他虽然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但性格天真，一副老睡不醒的样子，笑起来还像个中学生。

他的案子听起来很重，是“反革命阶级报复杀人案”。在十年浩劫中，此类案件能逃脱一死就是幸运的了，但彭灼南仅获刑20年。

案发与其父有关。彭嘉衡回到大陆后与未婚妻结了婚，五十年代时工作也还顺利，生活还算愉快。然而自六十年代初狠抓阶级斗争之后，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他历史上的问题太多了。第一是出身华侨，全家还在印尼；第二曾毕业于国民党的军官学校；第三在美国军官学校中深造过；第四又在美国军队当过军官。凡是经过文革的中国人看到这个履历就可以推算出他会遇到多少麻烦和苦难。做检查交代、控制使用、降级使用、大会小会批斗等等都不会少，对于这些，彭灼南不甚了了，因为文革开始那年他才7岁。等到了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是个非常有个性的青年了。有一次看到他母亲向上级为彭嘉衡多年来被误解、被冤枉一事写的申诉，他才知道父亲的悲惨遭遇，信中提到首都机场保卫处长张某在迫害彭嘉衡上表现尤恶，多次殴打彭嘉衡，彭灼南看了怒火冲天，想找个机会报复。他知道这一报复的结局，那时强调阶级斗争，保卫处长的身份和行为是代表无产阶级以及党和政府的，报复他不就是向无产阶级专

政进攻嘛！这些作为高中生的彭灼南都明白，但他还是决计一搏。

经过筹划，彭灼南偷偷拿了家中的全国粮票还有一些钱，请平常在一起玩儿的小哥几个吃了顿饭，算是与他们告个别，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意。一天下午放学之后，彭灼南背着书包去了张家，两家离得也很近，张某的女儿与彭灼南还是同班同学。他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他的同学。“你爸在家吗？”女同学告诉他在里屋。彭灼南推开里屋的门，张某正坐在小马扎上看报。1米83的彭灼南俯身一把撕去挡在张某脸前的报纸，厉声问张：“文革中是你打我爸来着……”张还没回答，更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彭灼南已经从书包里抽出切面包的餐刀向张扎去。张本能地围着桌子跑，向他求饶。这是彭灼南最感快慰的，曾向我说过数次，每次说的时候都露出得意的憨笑：“平常谁都怕这个保卫处长，他一瞪眼不仅五类分子有问题的人怕他，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惧他三分。这回他向我求饶了！”彭灼南毫不动心一共刺了张四刀，有一刀扎穿了脖子。扎完人他夺门而去，最初还准备跑（身上带了钱与粮票），后来他看到逃跑很困难，就到机场派出所自首了。

此时他还不满18岁，又事发在1976年，当时也是惊天大案。可是审判时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人们对于文革中被整的人多了些同情，因此这个典型的“阶级报复”案件最后只判了20年。据说被刺成重伤的张某又查出与林彪集团有些瓜葛，彭灼南事件的政治性质更加淡化，因而也就被减了十多年的刑期，只在监狱呆了几年就被释放了。

1977年，彭灼南到三中队服刑，他被安排到与张建旗一个机台上干活，张建旗还对他有点照应。张建旗不吃细粮和肉时便都给了彭灼南，彭灼南细高的个子像豆芽菜，成天晃悠悠，丢三落四，老像神不守舍。有个老犯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大秧子”（北京方言中指少爷公子不明世故、不会办事），这个外号很传神。张建旗高大而壮硕，稳重而富有精力，他与彭灼南的关系有点像大哥与小弟。

有一次接见日之后，彭灼南很兴奋，跟我说：“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对我这样好过！要是我因为‘玩闹’（当时称小流氓各种违法活动）进来，决不会来看我。”说着眼睛都亮了，其情景至今我记忆犹深。

再度见到彭灼南是33年之后了，此时他已经五十多岁、闯荡过日本和欧美许多国家了。他也像父亲一样在美国呆了很久，但不是去学习，而是开长途载重汽车，藉以谋生。他挣了一些钱，最后还是回到中国。此时父亲获得了迟到的荣誉。2005年9月，二战胜利60周年，彭嘉衡收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亲笔签名的信。在印有美国国徽的信纸上写道：

“尊敬的彭先生，参议员科尔尼已经转发了您8月1日的信。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您的消息，并对您曾经作为一名‘飞虎队’成员而致敬。献上我最恭敬的祝福。乔治·布什。”

此后，彭嘉衡抗日战争中的事迹遂为人所知，一些老战友也得以往来。彭灼南看到和分享了父亲的快乐和荣誉。晚年父亲得了白血病，住院花费极大，媒体披露这个信息后，人们纷纷解囊相助。彭灼南也为父亲献上了骨髓，尽了儿子最大职责。老人于2010年8月22日在北京辞世，享年90。彭灼南又代表父亲完成了他最后的遗愿：将其账户中余有的十多万元“再捐出去，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白血病患者或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在关键时刻，无论艰难还是顺畅，彭灼南都是父亲的一部分。

节选自作者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鸿爪掠影》。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 原载《昨天》第五期



~~~~~  
【当事者说】

我经历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

• 吴忠口述 • 陈楚三、李大震整理 •

整理者说明：本文由北京卫戍区原司令员吴忠将军1986年夏与陶然女士的谈话录音整理而成。

一、事件的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

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诱因被搞得很复杂，到现在好多人不清楚。我比较清楚或者相当清楚，说完全清楚也不是。

天安门事件的诱因是周总理逝世后悼念的规格。

总理逝世的当天早晨，8341部队的一个同志曾风（音）给我打电话，说总理去世了，现在心情非常沉重，要我马上去医院。我赶到北京医院，这时总理遗体并没有放在太平间，而是放在里面的房子里，正给总理理发、刮胡子、刮脸；这时人还很少，主要是医院工作人员。大家光流眼泪，谁也没说什么话，人不多。后来穿衣服，邓颖超同志到了。从遗体告别到火化，总理都是穿过去喜欢穿的旧衣服，这是邓颖超同志的意见。穿好衣服后送到太平间，我就回来了。

筹备总理追悼会的工作。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我感到不够规格。我问过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同志，过去国家领导人遗体告别在哪里？他说在太和殿、劳动人民文化宫。我想应该在比较宽敞些的地方，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和殿啊，或者人民大会堂啊，为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在追悼总理的问题上，全国各地，大小单位，都想在自己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是群众自发的。但从中央来了一个精神，不让各单位搞，劝阻群众不要在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我们心里不舒服。你在人民大会堂悼念总理，你在北京医院遗体告别，各单位来的人很有限，摊不了几个人，才三四个人，就是几万人也不行啊，北京800多万人哟！你当代表参加了总理追悼会，我呢？群众都想参加总理追悼会，都到北京不可能啊，自己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这不是很好嘛！不晓得是来自中央什么人的指示，很不理解。各单位要设灵堂，可是遭到干涉，干涉来自中央。中央怎么考虑的？为什么在总理逝世的规格上有这个讲究？当时不理解，现在也不理解。毛主席是说了话了还是没说话，说了什么话，根本不知道。对毛主席，我当时有这样一个不理解的地方：总理病重时，我没有听说毛主席去探望总理；但是毛主席把他家的沙发送到总理那儿，这个沙发大，让总理坐得舒服些。但没听说毛主席去看望总理，我的印象中沒有，要是有我怎么不知道呢？

总理的遗体告别毛主席没去，追悼会毛主席也没去，我感到很不理解，毛主席应该去。陈毅同志去世，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毛主席去了，影响很好。总理病重，也没听说主席去看望过，当时我就很有想法，这是为什么？是毛主席病重吗？说病重，可是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还不断接见外宾呢？是多次接见外宾。既然可以接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参加遗体告别？

规格受到限制，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从中央来的。群众很不满意，不光是北京市的群众

不满意，全国人民都不满意这件事。人民群众这个不满一直受到压抑，一直积压着，酝酿着，等着到清明节。清明节一到，群众是一定要搞大规模的悼念总理活动的。

## 二、中央要求劝阻群众送花圈

清明节就要到的时候，北京各大单位都在做准备工作。都在准备，准备花圈啊，街上白纸都不好买了，脱销了。各单位群众都在做花圈，花很多钱，群众自己出钱。群众准备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怀念周总理。各个单位，各个工厂，各级领导与群众的情绪是完全一致的；部队的干部、战士、机关，也是这个情绪；我个人情绪也是这样，感到清明节群众扫墓、悼念总理有什么不好呢？

群众从4月1日就开始陆陆续续送花圈，不是清明节那天才开始，天天不断，越来越多。这时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从政治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要劝阻这件事。吴德召集几个书记，我（当时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也参加了这个会，书记也不一定全，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也没有说中央是哪个讲的，只说中央的精神是劝阻，劝阻群众，不要把规模搞那么大。吴德同志布置，要我召集各口讲话，通过各级党组织布置下去，要各级党组织做工作，劝阻群众不要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不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

当时我一听很犯难，我说这个会议我不召集，我不讲，你叫倪志福、丁国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同志讲吧，一、二、三书记不讲为什么让我讲？你们召集呀，我分管的是政法系统，专管政法啊，拒绝了。吴德没有勉强我，布置丁国钰同志去召开这个会议，让丁国钰去讲。丁国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讲了几条，说总理健在的时候讲过清明节是鬼节，等等。群众对这四条很不满意，抓住丁国钰讲的四条不放，其实哪里是丁国钰的？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也不是吴德一个人的。

吴德要我布置值勤的警卫战士、公安人员、民兵，如果花圈送到天安门附近，要劝阻一下，劝群众拿回去，不要放到纪念碑那里。我一听更不对了：群众把花圈送到天安门的附近，他能拿回去吗？群众把花圈都扛到天安门附近了，值勤的战士、公安人员和民兵动员他们扛回去，能扛回去吗？不可能的，群众气大得很，战士、警卫人员劝阻，他非要送，这不就冲突起来了么？我说不能这样布置，当场拒绝了。我说你让警卫战士劝阻，那还不如让各单位党组织劝阻，要各级党组织动员群众不要送花圈。他不送，不到天安门附近来，那就不存在让战士劝阻的问题了嘛！只要送到天安门附近，就不能劝阻，只能协助群众把花圈安放好、排列好，保护群众安全，防止外国人搞破坏活动，防止坏人破坏花圈。当时吴德同志没再说什么，也没勉强我，看样子他理解了我的话。

对警卫部队、公安人员、值勤民兵布置时，我要求：群众送花圈，你们第一要保护群众安全；第二要协助群众把花圈放好，安排得有秩序、不乱摆，要整整齐齐摆好；第三要注意外国人的活动，防止外国人趁机搞情报、摄影，随时与公安局取得联系，制止外国人的违法活动；第四就是保护花圈的安全，防止坏人放火把花圈烧掉，制造政治上的混乱，也发现过有汽油一类的物品。我就是这样布置的，记录在案的，没有说劝阻群众送花圈。布置以后，群众送花圈就没有障碍了，没有人劝阻，排列好，安放好，秩序很好，一点都不乱。

纪念碑摆满了，广场摆满了，一直摆到灰观礼台，也摆满了。再送往哪放呢？和倪志福研究，把红观礼台开放。红观礼台也摆满了，在红观礼台上很醒目，很壮观。过去五一、十一，高级领导人上天安门，军级干部、省军区司令上不了天安门，就在灰观礼台，兵团级干部进红观礼台。群众都知道这些，所以花圈摆上红观礼台，特别高兴，喜笑颜开，警卫战士的态度也非常好。

### 三、政治局改变决定提前收花圈

4月1日送花圈的还不多，3日、4日、5日多。一方面是送花圈的多，看群众送花圈的人也是川流不息，看花圈上写的字、诗词，有的发表演说。诗词也很复杂，绝大多数是悼念总理的，歌颂总理、怀念总理的诗词；也有一小部分，不是很多，骂四人帮；也有极个别的，影射、攻击毛主席。再一种情况，确实有少数人混到群众中乱来，他不是悼念总理，而是打人啊，起哄啊，鬼叫、口哨啊，往空中扔帽子、扔自行车，人抬起来往上扔，胡闹，捣乱。另外，也确实有越狱逃跑出来的，刑满释放的，有骂毛主席的，抓住的也有。特别是晚上，我们怕把花圈搞坏了，烧掉了就麻烦了。

花圈最多的时候是4日，清明节。红观礼台4日才摆满。4日白天秩序井然，到晚上确实有一两个人，在纪念碑西南角，离我们小红楼一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里演讲，公开骂江青。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围得水泄不通。骂江青嗓子都哑了，我们没有向上面反映情况，也没有派人去抓。老实说，骂江青的人我还真不愿意去抓他。江青仗势欺人。我到北京以前在四十军。1968年以前，她在一次会上公开讲，谭震林是大叛徒！我很反感，谭震林同志是不是叛徒，你有什么资格讲？中央做出决定，中央来传达。你不就是毛主席的老婆吗？有什么了不起？刘振华是四十军政委，他就说，毛主席呀，你把老婆弄出来干什么？起什么好作用？破坏毛主席的威信。江青这个人，我讨厌，仗势欺人。所以没派人去抓骂江青的人。

后来，《人民日报》的鲁瑛（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写了一个条子送到在大会堂开会的政治局，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周围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骂哑了都没人管。江青在政治局会上暴跳如雷。倪志福参加会议回来讲：江青指着陈锡联说“你是司令”，指着纪登奎说“你是政委”，“还有北京的那个二吴（指吴德、吴忠），我们中央的安全究竟有保障没有？”中央会后，吴德给我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嗓子都骂哑了没人管，要立即抓起来，要放跑了拿你吴忠是问！我们相处这么多年，吴德从来没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过话。我想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吴德个人的意思。吴德个人对我吴忠使这么大劲干什么？要拿我是问！我听了有点反感，但要执行啊！接电话后，我就派公安局副局长、指挥部的管纪江（音）去执行这个任务，让他带几个公安人员，卫戍区值勤的戴上袖标，维持秩序，掩护一下，把那两个人抓起来。管纪江带了十来个人出去不久，吴德、倪志福就坐车到我的小红楼来了；在楼下碰到管纪江抓的两个人正往车上放，吴德问是不是这两个人，管纪江说是；吴德、倪志福上楼来告诉我那两个人已经抓了，然后吴德打电话到大会堂向政治局汇报，这件事情就算了！

但是，鲁瑛写的条子送到政治局，江青暴跳如雷。张春桥强调12点已过，清明节过了，可以收花圈了，把政治局已经定下来的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4日晚上就收花圈。把政治局原来已经确定的6日收花圈提前两天，这是造成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原因。

据倪志福同志讲，那天晚上政治局本来有个收花圈的议题，已经讨论过了，6日收花圈；如果6日收花圈，天安门事件肯定不至于发生，群众也是要求花圈放到6日，总是要收，不能老放在那儿。议题已经讨论过，通过了，一致意见是放到6日。江青这一大发雷霆之后，张春桥一看手表，说现在已经12点了，清明节已经过了，可以收花圈了！这样就把已经通过的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华国锋主持会议，你也不说，已经决定了的问题嘛！为什么不说这个话？也不知道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那些老同志当时有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将近一点钟，吴德回来布置收花圈，我一听就说，不能这样搞，群众第二天一看没花圈，矛盾就大了；他说，啊呀，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是执行问题。我说，北京市这样搞，非搞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当时我就是这样说的。吴德说，中央已经决定了，现在是执行问题，派车吧，北京市派100台，卫戍区派50台。我就把后勤部长找来，他说能派，我也管不了，收就收去吧！

#### 四、群众要求还回花圈引发冲突

这时，陈锡联同志召集会议，要我和吴德去参加。吴德是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我一到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会议已经散了，吴德、纪登奎在那里；看到陈锡联、纪登奎同志，这两人的情绪非常不好，也不知为什么，口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一句什么话。到了那里以后，有秦基伟同志，印象里有梁必业，陈锡联是主持军委工作的，还有我、吴德。陈锡联讲了两件事。第一讲情况，说南京、成都、太原、重庆，是发展的趋势，南京不是群众游行吗？保定很乱，保定离首都很近，对首都威胁很大，意思是说事态在发展。第二，凡是调到北京境内的部队，统一由吴忠、卫戍区指挥，部队往北京调由军委下命令，命令由军委下，只要进北京境内就由吴忠、卫戍区指挥。

我和吴德回来，路过天安门广场，天已麻麻亮，花圈还没有收完。我回家睡觉，还没有睡着，警卫处处长张冠金（音）打来电话，说王洪文到了小红楼；我听了没说马上去，也没说让张冠金记录有什么指示，继续睡觉。前几天碰到张冠金还说起这事，他说没错，我没说去，也没让他记录。要是换个人还要分析，比如陈锡联到了小红楼，我保证去；要是华国锋到了小红楼，我还要考虑；王洪文到那儿，我还真不去。那天晚上我也没怎么睡，迷糊了一会儿，快到八点钟，我估计情况很严重了，得出去看一看了。

八点钟的样子，我到了金水桥前的华表位置，国旗杆的地方，一看纪念碑的台阶上，站满了穿黄军衣的战士，个子又高，四面人墙。我感到很难看，搞四面人墙干什么？我就到纪念碑台阶上，曾绍东同志在那里，是管警卫的副司令，我说老曾啊，我看了非常难看，赶快撤掉。他说，送花圈要往纪念碑挂呀。我说你让他们挂啊，悼念总理嘛，纪念碑台阶守着干什么，又不是阵地，赶快撤了，群众影响不好。他就撤了。

这时公安局的宣传车、广播车已经被群众推翻。接着群众涌到大会堂东门，人很多，要花圈，把警卫团的一个参谋也打伤了，我留下来处理。电话很多，刘坚（音，大会堂负责人）的电话，说紧张得很，参谋也打了，怎么办？告急。汪东兴也打电话，说群众冲大会堂东门。一会儿，张耀祠打电话，说吴司令啊，大会堂情况很紧张，你要保护大会堂的安全。张耀祠的电话引起我很大注意。他在毛主席身边，是自发给我打电话，还是毛主席知道了情况要他打的电话？但他没说是毛主席让打的。我想，恐怕毛主席知道了。于是就找马小六，动员民兵维持秩序，让群众下来，不要把冲突扩大。民兵出去，一点反应都没有，民兵的情绪和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的情绪是一样的，让他们动员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下来，一点效果都没有，我们不能让民兵强制往下拉呀！一是民兵可能劝说了，群众不听；另外民兵也不卖力气去劝说，情绪是一样的嘛！我一看一点效果也没有，人越来越多，广场越来越乱。我回到卫戍区礼堂，把管警卫的一师、二师领导找来，曾绍东也反映这个情况，邱巍高副司令也反映这个情况，当时一师、二师的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

事态继续发展，警卫一师、二师维持秩序已经没有能力了。他们站岗、放哨的部队已经展开，卫戍区站岗放哨的部队11个团，本来机动力量就很少很少，维持不了这个秩序。这时吴德来了，还有杨俊生同志，吴德主持我们几个在场的副司令、副政委开会研究，是否调三师、四师进城，不进城维持不了秩序。吴德同志要我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打电话，我直接给陈锡联同志打电话，说警卫一、二师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但事态一直在发展，冲东门的情况还没解围，我们研究调三师、四师的部分部队进城，维持秩序，都是徒手。陈锡联同志同意，说可以调三师、四师部队进城，调多少，你们和吴德同志研究。做好计划后，分三批调进五六千人。但冲东门的问题还没解决，你不能往下拽啊！几千民兵维持秩序，也没法制止。这一天群众不是送花圈了，是要花圈。把花圈搞哪儿去了？汪东兴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解决冲大会

堂东门的问题，我说下午两点吧！组织力量还要时间……两点后还没解决你再找我。其实不到12点就解决了，一个日本人在里面照相被发现了，群众把照相机夺过来，拉出胶卷曝光，打他，日本人往历史博物馆跑，群众“哗”就冲向历史博物馆，大会堂东门就没人了，就这样解决了问题。有人说：花圈在中山公园。群众又涌向中山公园了。

## 五、一伙人闹事烧车烧楼

后来情况发展越来越厉害了，确实有一伙小流氓，砸汽车；中午给公安、民警送包子馒头的车被搞翻了，包子、馒头洒得满地都是，还有人叫好，这伙人越闹劲越大，接着烧汽车，一下子烧了四辆汽车，是民兵指挥部的、公安局的，在小红楼指挥部停着的；自行车就烧得多了，踩扁、砸烂。以要花圈的名义，翻汽车、烧汽车。当时群众就有议论，烧汽车这不对呀！接着又往指挥所小红楼扔砖头，砸玻璃，把自行车零件拆下来往上扔；楼下是一家老百姓，他们把老百姓家的煤气罐搬到门口，打开煤气罐点火，把小红楼的门烧着了，烧自行车、烧汽车，接着就烧房子。这个小红楼是警卫一师十三团第三营的营部，第九连驻在这儿，连部、营部，一个连的部队，担任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煤气罐一烧，小红楼的门烧着了，楼就也烧着了。小红楼二楼是洋灰地，烧着不容易，但烟子呛得够呛。这时有卫戍区的曾绍东、邱巍高，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还有公安局的一些同志在。曾绍东向我报告楼烧着了，楼口上烟雾很大，虽说底下着火，楼上的人很沉着，没有乱动，玻璃都砸光了也没有乱动，继续在楼上坚持。如果火烧上去，楼梯一烧，楼上的人下不来，会把指挥部的人烧死；我直接打电话请示华国锋，说指挥部楼已烧着，要撤出来继续工作，华国锋批准撤出。军队的习惯，指挥所转移要向上报告，我直接报告华国锋，他同意了。我就给曾绍东同志打电话，要他撤出来。

华国锋同志还向我问一个问题：冒白烟的是什么？我说看不清楚，不知道。我在卫戍区机关，隔着公安部、历史博物馆，怎么能看见呢？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看得清楚。我说会不会是烧汽车轮胎、自行车轮胎冒白烟？华国锋说不像。我让曾绍东撤出去，要历史博物馆警卫三师的一个营，胡世寿同志带的这个营，胡世寿当时是副师长，我让他掩护指挥所撤出去，维持秩序把群众隔开，清一条路让指挥所撤出来。胡世寿这个营出去了，围着小红楼把群众隔开，曾绍东他们是从厨房的窗户那面墙撤到邮电局里面去了。这时楼上不知怎么搞的还有个卫生员，卫生员打了一次电话。后来他们报告，有些人上了二楼，抢东西，抢武器，搬武器弹药，卫生员报告的情况。我告诉胡世寿把楼围住，不让这几十人跑掉。他们上了楼就抢东西，把抢来的东西捆的一大包一大包地背下来，下来一个抓一个，他们还偷了一把手枪。着火的时候就告诉小红楼的人把武器弹药拿下来，不要被烧掉。指挥所撤下来以后，那些上楼的人不能叫他们跑掉，这不是对曾绍东讲的，是给胡世寿讲的，这时曾绍东已经不在指挥所了。这20多人就是这样抓的，28个，战士们非常熟悉这20多人，说烧汽车、翻汽车、烧房子就是这些家伙，不知道名字，但就是他们，可抓住了。小红楼那28人，叫公安局审查，他们烧自行车、烧汽车、烧楼，抢东西都是他们，打了一天交道了，名字不知道，但就是这些面孔，留着八字胡，穿着胶鞋，一看就是小流氓。

这20多人抓了，但是直到天黑，广场上的人还很多。

## 六、政治局决定包围天安门广场

这时毛主席有指示了，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又打、又砸、又烧，性质变了。华国锋当时在大会堂。吴德同志回来传达的。

到下午四五点钟，中央要吴德讲话，用有线广播。吴德让刘传新起草，自己修改后送中央。据吴德讲，毛主席看了，批示说照办。退回来就在广场的有线广播上广播吴德讲话。五点半开

始广播，让群众离开，不要上坏人当。这时群众很多，有的听了很反感，“我来广场，哪个坏人给我任务了？”看这个架势，是要抓人了，很反感。天快黑了，吴德讲话过了很长时间了，吴德从政治局开会回来；政治局开会决定镇压反革命，包围天安门广场，抓坏人。开会时就从大会堂打电话调动民兵了。据吴德讲，开始王洪文说要调20万民兵，最后确定调10万，实际落实的不到5万。吴德回来传达中央决定，民兵10万布置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干警布置在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和西交民巷，卫戍区的警卫部队也参加，还是上午维持秩序的那个部队，布置在历史博物馆，小红楼周围。行动时间是八点半。

镇压是中央决定，还有毛主席的话，八点半开始。考虑到卫戍区礼堂看不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还不如政治局了解情况及时，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一窗之隔，看得清楚。这时政治局有多少人在人民大会堂，我不清楚。我知道陈锡联在那里，他老给我打电话。其他哪些人在不知道，华国锋可能在，“四人帮”什么人在不知道。吴德同志对我说，你到历史博物馆，就近观察情况，部队八点半行动，由你来通知。我不就成了现场指挥了吗？

我带了王秘书，穿过隔离带到了历史博物馆，博物馆领导安排我们在二楼（或三楼）一个有电话的地方。我是打着手电筒从公安部过去到历史博物馆的。警卫一师指挥所也在历史博物馆。田占魁同志也在那里。我先到田占魁的指挥所了解情况，一看人很多，接着上楼找到看得清楚、有电话的地方，我的指挥所就在这里，王秘书一直在这里，我有时离开也不远。

## 七、把包围广场时间推迟两个半小时

八点半钟快到了，广场上人很多，开灯是八点半前。政治局研究时，开灯是王洪文的意见。开灯就是要采取措施了，让群众离开，减少人数。开灯和吴德讲话，都是为了执行八点半包围广场的措施。

广场的最大容量是42万人。我看到广场密密麻麻，是几十万人，绝对不是几万人，不能动，四面包围非踩死人不可！我想回卫戍区礼堂给吴德同志提建议推迟时间。又一想，八点半是中央的作战命令，我去提建议，书记在场的有丁国钰、倪志福、杨俊生等同志，吴德主持会议研究，能做出一个决定推迟时间？不执行中央的八点半，执行北京市委推迟时间的决定，吴德做得到吗？做不到！讨论的结果很可能是坚决执行中央决定，提这样的建议还不如不建议。你建议了，也讨论了，请示了，报告了，决定是坚决按八点半执行，你还敢推迟啊？我一想，干脆谁也不请示，谁也不报告，就是不动。

我派警卫一师的副师长张志民（音）同志看看广场还有多少人，一看不得了，还是人很多，什么时候人才能减到最少的限度呢？我想只能推迟到11点。11点是北京市公共电汽车的末班车，你不离开广场就回不了家了。

果然，11点以后，广场上看不到多少人了。我又派张志民同志再去看一看，黑暗的地方看仔细点，不要出动时一下又出来几千人就麻烦了。他回来说，确实没有了，只有纪念碑台阶上坐着一圈人。八点半到11点之间，陈锡联同志给我打电话很多，说你怎么不动啊？广场上没什么人啦！我心想，你要广场上那么多人干什么？我想减都减不下去呢。我认为他在说胡话。那天我去倪志福同志处，倪志福同志说华国锋不满意，说“人都跑光了！”我就不明白，他们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就没想到人多会踩死人吗？我看是没想到。

11点以后通知部队、公安、民兵出动，我跟着卫戍区部队包围纪念碑台阶的人，这时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民兵还没过金水桥。我也来到纪念碑台阶下，没见到打人，要有我会制止。我问刘传新和公安局其他同志，你们清查，查到多少人？他们说查过了，不到150

人，怎么处理？我说两条：第一、什么人留下审查？带凶器，带反革命传单留下审查。第二、未带凶器、未带反革命传单问清单位，打电话查对清楚确是该单位的人，要单位领回去，或天亮前放掉，有事找他，没事就算了。公安局后来留下审查的人，不到50人，是不是带凶器、带反革命传单，我就不太了解了。但我规定的是这两条，我的意见是，没有理由说围住的人，围在纪念碑台阶上的，就是坏人，凭什么说人家是坏人？带凶器、带反革命传单的，是嫌疑，要审查。就是平时在百货大楼，碰到你身上带一把刀，公安人员也要把你叫到一边，问你带刀干什么？何况镇压反革命。我认为这样一过滤，筛减一下，人就少了。纪念碑这几个人，你就蹦八丈高也踩不死人。这样我们缩小了抓人的面，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围了人就抓、就关，那不对。

还有就是，我布置把汽车被烧的残骸赶快拉走，天亮前拉走处理掉，现场打扫干净；小红楼赶快修好，油漆好，恢复，要马上进行，恢复得比原来还要好看。布置完后吴德打电话，我说不到150人，报告了两条处理办法，吴德听了后说好，就这样执行。如果吴德有新的意见，我还可以再按他的意见办。为什么汇报那两条处理意见？我可以先问吴德，困住的150人怎么处理。他可以随便答复，“不要放走，审查清楚了再放走”，他要这样说就全部留下来了。我决定的两条不是全部留下，不是不问青红皂白，是筛减。

刚搞完回到卫戍区礼堂，政治局打电话通知，要吴德、倪志福去开会，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吴德要我和刘传新二人也参加，可能是他报告政治局要我二人列席会议。走到门口，吴德同志说，唉，时间搞晚了，这问题汇报时怎么解释一下。我们统一了口径：这是礼拜天，民兵集合得晚，挨家挨户叫，所以晚了；另外，车开出来，到处遇到红灯，车队七零八落，到得晚了。吴德说好。其实我准备了腹案，推迟了两个半小时，我不考虑还得了？

他们上车走了，我找我的司机大李，他到市革委会地下室吃晚餐去了，结果晚到十分钟。但会议还没开始，也可能是等我，反正还有其他人没到齐。毛远新做记录。我到了后汇报就马上开始。叫刘传新汇报，他讲得比较长，详细汇报。他汇报完后吴德同志问我有什么补充，我讲了三个事情：第一就是解释怎么晚了，说今天是礼拜天，民兵集合要挨家挨户叫，再就是车队出来到处碰到红灯，车队七零八落，还有的走错了路，耽搁了。王洪文就插话，应该搞个标志，车队出来处处开绿灯车队就不会散了。我接着讲，到得早的民兵也有，市财贸系统民兵，有几千人，但这部分民兵绝大部分是女民兵，执行这样的任务有困难。我把情况主动做了解释，也没有追问我。第二讲烧汽车、烧房子的十几个人抓住了（当时还不知道有20多人），是一伙小流氓。张春桥说，是流氓犯罪吗？我说当然，烧房子、烧汽车是犯罪。还讲了一件什么事记不得了，好像讲了三件事，很短。

后来江青、王洪文几个人讲，搞什么水枪，往脸上喷啊，外国警察不是用水龙头对付群众嘛，七嘴八舌。我一去就看华国锋不大高兴，不理睬我，我也不在乎。这天晚上就这样结束了，并没有打死人。打伤人可能有，但我在纪念碑那里没听到打人唧哩哇啦叫，相信拳打脚踢会有的，为什么？公安局老毛病，抓住小偷先揍一顿。我经常批评他们不能这样，是不是小偷你没搞清楚，怎么能打呢？打人、打伤人，不是那天晚上，是1日、2日、3日、4日，公安人员盯梢，有说反动话的啊，群众也搞不清楚，和公安人员冲突，打起来。5日晚上包围天安门广场，民兵打人我不相信。民兵没赶到，来的时候已经围完了，他打谁？另外民兵的情绪叫他打也不打，因为民兵不满这件事。

~~~~~

## 【史海钩沉】

山雨欲来——彭真“冷藏”姚文的历史背景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视为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由此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这篇由江青遵循毛泽东旨意组织撰写的被称为文革导火线的文章，以学术讨论之名行政治批判之实，把历史剧《海瑞罢官》看做“一株毒草”，将剧中反映海瑞当年“退田”、“平冤狱”的情节说成是借古讽今、鼓吹“单干”煽动翻案风，矛头直指剧作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但批吴仅是巧为名目的表面文章，背后的真实图谋乃是以此作为引线，由此及彼，引发一场清算刘少奇及其路线的文化革命运动。文章发表后，华东各省市报刊纷纷予以转载，但在首都北京却受到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冷遇，在18天的时间里北京报刊不见任何反应，既无转载也无评论，仿佛波澜不惊的一泓静水。彭真这种貌似“不作为”实为“冷藏”也就是“抵制”的行为，使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泽东大为恼怒，将北京市委斥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也让彭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成为其数月后被打倒下台的一个直接和重要原由。

彭真“冷藏”姚文，是链接十年文革历史最初环节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和非常事件。表面看起来它是彭真对上海方面未经中央批准擅自点名公开批评北京的副市长这一不无挑衅行为的不满与抗议，对姚文将学术批评政治化与史学影射极端化的反感与抵制。但进一步深入考察，就会发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它包涵着极为复杂的政治因素与情绪，映射着一层深厚的历史背景，是党内最高层长期存在的矛盾斗争进入六十年代之后不断激化与冲突，至最后总爆发前在次级层面曲折反映与微妙表现的一个片段。

—

事情需要从1962年说起，这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1958年的大跃进失败和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为民请愿的错误批判导致了一场令数千万人死于饥饿的大饥荒，国民经济因此而跌入到一个急剧衰退的困难时期。1962年年初，为总结经验教训，挽救艰难危局，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包括全国县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据其在湖南家乡实地调查的耳闻目睹，在所做政治报告中郑重提出，过去“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说法如今已不适用，认为当前的困难固有经验不足的问题，但也有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作风，因而将造成国家困境的原因认定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同时提到，彭德怀同志信中所说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人民公社，则明确指出，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刘少奇大胆而又实事求是的坦诚获得了大会的热烈支持与拥护，使数年来因形势紧张而造成的党内不满情绪得到一定纾解与释放。

然而，这却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使建国以来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因思想分歧而产生的矛盾骤然间呈显出一种紧张的态势。刘“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与形势判断，对于发明并惯用“一个指头与九根指头”来比喻形势大好的毛无疑是一大冒犯，毛刘声望与人气指数自庐山会议之后尤其在“七千人大会”上体现出的彼消此长同样令毛深为不安，因而当刘少奇等拟采取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选择时，毛泽东如坐针毡，再也无法容忍了——在毛看来包产到户（毛语“分田单干”）不啻是在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后退与复归，为严重的政治原则问题。于是毛泽东长期积蓄的对刘少奇的不满终于爆发。这一年七月的一天在中南海游泳池旁，毛泽东对前来汇报工作的刘少奇劈头一顿怒斥，质问刘“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为什么不顶住？”“压不住阵脚”？刘则以“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作为回答。（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页90）



这是党内最高层毛刘之间因矛盾斗争而爆发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这次冲突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明显影响了社会的走向和历史进程。毛泽东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随即召开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会上对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分田单干风进行了全力反击，重新祭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中国社会从此进入到一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严酷时期。

在这之后，党内矛盾进入一段暂时的相对缓和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如苏联赫鲁晓夫意外被逼下台）下重又不断积累，加上中央始于五十年代的一线二线之分趋向于明显化，让毛泽东从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理论幻觉中越来越感到一种被人架空、大权旁落甚至可能被人逼宫的政治危机。1964年底与1965年初中央召开的有关四清运动的工作会议期间，毛刘再次爆发冲突。这次冲突更为激烈，毛泽东对刘少奇等剑拔弩张的场面使两人的矛盾公开化、表面化，给党内高层投下了一层忧虑不安的阴影。毛泽东由此定下了政治上打倒刘少奇的最后决心。（详见拙文“从分歧走向分裂——毛泽东倒刘之史迹考察”）

在毛泽东汲汲于党内和刘少奇进行斗争的同时，没有忘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文化领域。建国以后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垄断性重视与排他性管制，使文化领域的批判斗争一直迭出不休，如对电影《武训传》、对《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胡风集团的批判，乃至反右。进入六十年代，由于阶级斗争与反修防修这两大历史主题的高调张扬与深入人心，毛泽东对文艺的看法更趋极端，“认为，文学艺术的某些发展不仅是种种不良倾向的表现，而且已成为通过上层建筑机构向社会主义根基发动进攻的武器。”（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基于对文艺界的严重判断，毛泽东就文艺问题做了两个著名批示。196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第一个批示中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部门，问题就更大了。”指责：“许多共产党人热衷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社会主义的艺术，岂不咄咄怪事。”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做出更为严厉的批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半年之内，毛泽东对文艺问题连续两次做出重要批示，如同连下两道圣旨，对整个文艺界做了基本否定的判断结论，给党内外带来了巨大震动。1964年7月7日中央做出决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负责“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该小组被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文革前夕被撤销，存在时间不足两年，成为后来赫赫有名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雏形。

新一轮批判的浪潮随即在文艺界开始掀起。夏衍、陈荒煤、田汉、阳翰笙等文艺界一些主要负责人和杨沫、梁斌、欧阳山、丁玲、秦兆阳等众多优秀作家受到批判，《北国江南》、《舞台姐妹》、《早春二月》、《谢瑶环》、《李慧娘》等一大批文艺作品被扣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大毒草”的帽子遭到否定。一些文艺理论观点如“写中间人物论”被看成“反对写英雄人物”，是要在“文艺创作上同革命英雄争地盘”，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站在反人民的立场”，“对于我国伟大现实、伟大人民的诽谤”，是“同毛泽东文艺思想针锋相对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文学主张”。（参见钱理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五页389—390；戴知贤：“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二 页614）批判的风潮很快便

扩展到经济学、哲学、史学、教育学医学卫生界等各个学术领域。一时间，整个文艺界与识界如惊弓之鸟，人人自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任何超出文艺批评自身范域的文艺批判只会带来文艺的伤害，造致文艺的萎缩与萧条，绝不会带来文艺的发展与繁荣，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铁律。中央感到了文艺批判过火的错误，1965年3月刘少奇主持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文艺界问题，认为，1964年以来的批判运动过火了，阻碍了创作繁荣，要赶紧刹车。“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则明确做出规定：“学术批评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央宣传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六页18）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当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感到文艺领域的批判过头而准备刹车之时，开启这场批判的毛泽东不仅意犹未尽，且兴意更稠，心志更雄，准备再上层楼，把批判引向纵深，以实现一个久蓄于心的更大的图谋。

## 二

1965年2月江青衔命前往上海开展一项特殊任务，是这一图谋的第一步骤。任务所以称之为“特殊”，乃是内容保密，除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之外，中央政治局成员都被绕过，不为所知。关于这项特殊任务，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PDF 页1233）中引述的毛泽东1967年5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外宾时的一段讲话，可以说明：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指北京——作者注）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

这就是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缘由，也是姚文写作发表的原因背景。毛泽东所以选择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靶的，一是戏剧作为一种程式化了的文艺载体，承载着大量的所谓封建的传统文化，毛泽东要创造一种全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对充斥着“帝王将相”与“才子佳人”旧戏的戏剧界向来抱有反感；二是吴晗为北京市副市长，又是知名文化人士，毛泽东就是要以北京市委作为攻克目标的突破口，所谓一石二鸟、一箭双雕，此之谓也。当然，此中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海瑞罢官》原是吴晗受胡乔木之约，为响应毛泽东1959年上半年倡导敢于直言的海瑞精神之号召，所写有关海瑞的系列文章作品之一，上演于1961年。毛泽东曾亲听海瑞扮演者马连良的演唱，称赞这个戏演得好，“剧本也写得好”。（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六页9注16）1962年江青观看之后，以其异乎寻常的政治嗅觉，认为该剧“存在严重政治错误”，向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等提出，“应该停止演出，进行批判，但遭婉拒。”（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六页10）其后江青又向毛泽东提出该剧有问题，需要批判，毛泽东未置可否。1964年9月彭真与陆定一向毛泽东汇报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时，毛还在表示，吴晗不要点名批评。此后，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六页11）毛泽东的态度变化，与江青以及康生的建言与怂恿不无关系，但毫无疑问的是，打倒刘少奇这一政治目标的最终确定则是决定毛态度变化最重要的因素。毛刘第二次爆发冲突发生于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间，江青衔命上海之行在1965年2月，二者背后的历史逻辑关系不言而喻。

发表姚文，如石击水，引来巨大反响与震动。客观而言，如仅以文艺观点、史学影射、话

语方式和上纲上线的程度而论，姚文与其时盛行的批判文章几无二致，毋宁说就是建国之后逐渐形成尤其是1964年以来大张旗鼓的文化革命大批判的延续与发展。但由于它赋有的特殊使命，又经最高领袖“御笔圣批”（毛泽东亲笔修改三次，见《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了文化批判的登峰之作与集大成者，因而产生的冲击更大，影响更巨，后果更严重。

正因为姚文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使命，首先感到其冲力的是党内“一些有政治经验的人”，“其它部门和领域的人们，对几年来文学艺术领域不断升级的过火批判已经习以为常，对此也未加重视。”（郑谦：“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史稿》卷三页5）彭真的第一反应是“感到极不正常”，因为“《文汇报》未经批准突然登出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违反了中央有关规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卷二下册页754）但，仅此原由只能称为“不正常”，还不能“极”而言之。能“极”而言之者，也就是使彭真感到姚文“极不正常”的，是姚文咄咄逼人的架势与来头让人产生的联想，是笼罩在姚文背后让人联想的巨大云团。

这自然与毛泽东有关。一直以来，流行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彭真“冷藏”姚文是因为“不了解文章背景”，包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年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仍持此说。此说隐含这样一个逻辑，如果彭真了解文章背景就不会“冷藏”姚文。这一说法似是而非，不能hold住，其实质是在回避矛盾，为尊者讳，不仅曲解历史，也抹淡了彭真坚持真理与原则的耿直个性。

据《彭真市长》一书记载：“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范瑾等同志开会研究‘转载’问题，当时决定，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如果姚文是毛主席定的，《北京日报》就登，否则不登。但结果江青、张春桥下令向北京、也向中央封锁消息而一无所获。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也打电话向上海方面询问，但也吃了闭门羹。邓拓同志等决定立即请示在外地开会的彭真同志。”（郑谦：“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载《彭真市长》页140—141）同一作者在“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一文中又说到，“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北京和其他各地报纸本来也没有一定要转载的义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史稿》卷三页6）既如此，北京何以会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要研究转载，并联想到毛泽东呢？

“早在姚文元文章未发表前，……张春桥去北京搞‘样板戏’时，曾向邓拓透过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风”。因为张春桥说，邓拓是其老朋友，要不跟邓拓打招呼，邓拓就会说不够朋友。（陈丕显：“文革初期，上海上演的阴谋诡计”，《陈丕显回忆录》连载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gd/lccz/article\\_2011091645442\\_2.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gd/lccz/article_2011091645442_2.html)）原来邓拓事先从张春桥处得知了姚文及其江青背景，文章见报后，进而联想到毛泽东，故有研究转载之举。

邓拓与吴晗是文友。一日吴晗听到风声，慌忙找到彭真，说有文章要批判他的《海瑞罢官》，而且文章大有来头。当晚彭真找来邓拓，询问“是谁要批？”邓拓如实答道是“江青！”（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pdf页9）

这就清楚地表明，姚文见报之前，彭真与北京市委已知其事且知背景有江青。文革前的江青地位虽不显赫，但毛泽东夫人和其政治秘书的双重身份意味着什么，对京城政治中人是不言而喻的。连邓拓这一级别的干部都能从江青与姚文的关系联想到毛泽东，遑论彭真！不惟如此，毛泽东虽然让江青组织姚文批判《海瑞罢官》绕过了政治局，但对开展批判《海瑞罢官》和吴晗，对政治局却是有言在先，放出过口风。

“1965年夏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提到要批判《海瑞罢官》。陈伯达参加了，

没什么反应，彭真也没向我们讲。”王力如是忆述。（《王力反思录》页369）陈伯达没反应是因为当时陈的关注点不在文化而在经济，而彭真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负责“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对毛提出的要批判《海瑞罢官》断然不会掉以轻心，没有反应。

陈丕显则明确地提到：1965年9至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主席针对西北局的工作讲了一段话，突然他话锋一转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说着面孔变得严肃起来，‘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北京的九月，原本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但听到毛主席这一句话，我不禁浑身感到一股凉意。与会者都感到惊愕，谁也没有理解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的含意。接着，毛主席把头转向彭真，问道：‘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面对这问话，彭真同志愣了一下，他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同前《陈丕显回忆录》；参见钱理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五页415）

毛泽东问批吴晗不过一月，批吴的姚文即见诸报端，老道的彭真决不至于天真轻率到将二者仅做偶合的联想，更何况已明确知道江青为文章组织者。

“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这是姚文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最为人诟病却最露锋芒的部分，涉及的正是“七千人大会”前后发生在毛刘之间的路线之争这一党内极为敏感的历史事件。

正是感到了姚文背后毛泽东巨大的身影，姚文字里行间透出的政治批判的话语霸气与对历史事件的强烈影射才使彭真“感到极不正常”。这种“感到极不正常”的感觉，来自于党内斗争长期体验的敏锐反应，也是复杂政治现实观察的直接结果。

### 三

政治中人尤其是权力中人最为敏感，见事最快。在1965年这个多事之秋，年初毛刘爆发冲突所搅动党内不安的阴影还没有消除，九月一直蛰居京城、受到贬黜的前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与黄克诚分别遣去西南三线和山西，11月姚文发表的同一天，杨尚昆又被免去中办主任，贬遣广东，接任的是资历与能力都差一大截却是毛泽东亲信的汪东兴，彭真亲自找杨谈的话（见《杨尚昆日记》），压抑与凝重的场面让人难堪……这一切现象，所发生的人事异动，不能不让身处中央权力核心层的彭真生发联想，不能不让他“感到极不正常”，感到某种山雨欲来之前的异象。

当然，毛泽东借姚文以发动一场倒刘运动的这一真实目的隐藏极深，连康生和参与组织姚文的张春桥都不曾察觉，人们只是到了后来才恍然大悟，彭真当时不可能识出。但凭着几十年党内斗争的经验，彭真可以判断，此回姚文来者不善，大有文章，至少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意识形态批判，包括吴晗在内的某些同志可能要遭及祸殃。

据彭真秘书张道义回忆，“彭真同志对干部是很爱护的，完全不是随便整人的那种坏领导”，他“是反对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动不动就乱上纲乱打棍子的。”这“是他从延安整风中吸取的教训。”彭真一向强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多次引用“古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到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的关系时讲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名言。（李海文、王燕玲：“秘书张道一谈彭真与毛泽东1963年后的关系” 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114/9116/20020929/834027.html>）就在姚文发表前不久的9月23日，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还就文化政策问题讲过这样一番话：“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也好，人民内部也好，不论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文艺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地方只能服从真理。”（引自《彭真传略》田酉如著人民出版社页270）

因此，彭真虽然不可能勘破隐藏在姚文背后的倒刘图谋，不能察觉“意在沛公”的“项庄舞剑”，但可以感到姚元这柄挥舞的利剑，感到利剑逼人的寒光，他当然不愿意看到寒光逼人的利剑伤及自己的属下，看到上海批判北京的文章刊登在北京的报上，让不良影响在自己的领地广为传播；更不希望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极不正常”的时刻界节外生枝，让一篇触及党内敏感事件的政治批判文章惹事生非，推波助澜，造成混乱，带来不安定因素。他知道，任何一次不小心的文艺与学术领域的批评都有可能导致一场难以承重的政治批判甚至政治运动，何况姚文已属明显的政治批判，这当然是他不愿意看到出现的。于是，接到邓拓的电话请示后，下令对这篇明显挑动是非、挑起论战且涉及北京市委的文章不予转载；热文冷藏，避其锋芒，以沉默表示对姚文的不认同，以抵制表现对属下的保护，在彭真，是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勇于担当的责任反应，也是其进退有据的策略选择。

当然，此中多少也含带一种对江青不满甚至对毛泽东埋怨的情绪贯于其间。1963—1964年间，江青到北京蹲点京剧改革，在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沙家浜》的过程中，江青的盛气凌人和挑剔霸道的脾性让北京市委不堪忍受。江青与彭真“发生冲突”，甚至两次到彭真家里争吵，以至于彭真最后忍无可忍，愤然说道：“我不管她什么人！我要到中央去告！”（李海文、王燕玲：“秘书张道一谈彭真与毛泽东1963年后的关系”）而毛泽东1963年12月对文艺问题的第一个批示，本来就是“冲着北京市委来的。表扬上海，批评北京。”（出处同前）京沪之间的暗中较劲，北京为此憋着一股气，如今斜刺里又杀出一篇姚文，剑指北京，且江青又是幕后指挥，前气未消，新添烦恼，彭真自是意绪难平，“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 pdf 页13）至于对毛的埋怨，则是因为上半年中央明明已认为64年以来文艺领域的批判过头，要刹车，规定“学术批评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央宣传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却他老人家偏独断专行，反其道而行之，弄出一篇姚文，拿“脚踏实地、忠诚刻苦的学者和同志”（彭真对吴晗的评语）为靶的，进行批判，让属下不知所措，无所适从。11月28日，在周恩来与罗瑞卿先后明确告知彭真有关姚文内情之后，“中央书记处指示北京的报纸予以转载”，周恩来、彭真和中宣部一起研究转载问题时，邓拓说到：“吴晗现在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仍大声说道：“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pdf 页14）其不平意绪，依然难掩。

明知姚文背景而将其“冷藏”处理，这一在外人看来具有明显“对抗”意味的行为，显示彭真坚持真理与原则的秉性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出当时中央政治的一种微妙之处。毛刘之间的矛盾分歧，无形中形为“两条路线”之争，让彭真等属僚时常面临着政治行为的选择。彭真从延安时期就深得毛的器重，建国后一直被委以重任，对毛从来就怀抱着敬仰之心，但毕竟是刘少奇原北方局的一员大将，且治政理念也更接近于务实的刘；而中央一线二线之分，让彭真更多接受的也是刘的领导。因此，敢于置姚文背景于不顾，除了姚文本身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让

彭真可以理直气壮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刘邓等一线领导可为依赖与支持。中宣部长陆定一支持北京市委的做法，刘少奇私下表示过态度，认为“文章写得并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势压人，”“不赞成这样做。”（见叶永烈：《陈伯达传》）

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彭真有过一次惊人之举，曾对毛泽东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今次再度“犯上”，对钦点的姚文进行“冷藏”。两次的不同凡响可以说都是忠勇之士发乎理直气壮的正义之举，但后果迥然不同。1962年，毛泽东显示了虚怀若谷（至少表面如此），彭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继续得到重用；1965年，时移势易，彭真不复了当年的境遇，毛泽东从大跃进失败后政治上的守势转入攻势，从战略防御转入到战略进攻。

毛泽东组织发表姚文，目的就是通过批吴批《海瑞罢官》激发矛盾，挑起论战，以此作为突破口，引发对刘少奇及其路线的清算。喻言之，毛泽东点燃姚文，希望看到的效果是人们火上添油，而彭真的“冷藏”无疑是“扬汤止沸”，与毛意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毛泽东自是对彭真大为失望与不满。姚文不仅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根导火线，也是其检测真假革命派的一块试金石。彭真的表现已形为毛泽东实现倒刘战略目标的障碍，因此而开始失去毛的信任，为数月后被打倒下台埋下了伏笔。

□ 原载《共识网》2012-02-17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